

前后蜀文学研究

张海著



前后蜀文学研究

张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后蜀文学研究 / 张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325-6983-0

I. ①前…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前蜀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后蜀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1788 号

前后蜀文学研究

张海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6983-0

I · 2722 定价：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课题

四川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
后期资助项目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1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3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4
四、前后蜀文学的研究范围	6
第一章 前后蜀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8
第一节 前后蜀历史简述	8
一、唐末蜀中形势	9
二、王建的崛起与前蜀的建立	12
三、前蜀的统治	16
四、前蜀的灭亡与后蜀的建立	20
五、后蜀的统治	24
六、后蜀的灭亡与北宋的统一	28
第二节 时代转型期的文人心态	30
一、战乱年代与文人命运	30
二、文人心态的剧变	34
第三节 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	39
第四节 前后蜀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	58
一、好学尚文,广纳贤士	58
二、兴办学校	59

三、搜集图书,刻印书籍	60
四、恢复科举	62
第二章 前后蜀作家考论	64
第三章 前后蜀著作考略	105
第一节 经部	105
第二节 史部	107
第三节 子部	114
第四节 集部	121
第四章 前后蜀的诗词研究	132
第一节 前后蜀的诗歌	132
一、前后蜀诗坛的形成	133
二、前后蜀的诗歌创作	139
第二节 前后蜀的词	163
一、西蜀词派的形成	165
二、西蜀词的内容	179
三、西蜀词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205
第五章 前后蜀的文章研究	212
第一节 奏议之文	213
第二节 论辨之文	222
第三节 论文之文	233
第六章 前后蜀的小说研究	239
第一节 前后蜀的轶事小说	240
第二节 前后蜀的志怪小说	252
结语:前后蜀文学的文学史定位	264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76

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五代十国是晚唐的延续，北宋的肇端，处于唐宋这两个文学高度繁荣时期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

在我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然而，若干战国形态的分裂时期不时与之交替，为时也并不短暂。五代十国，就是在统一遭受破坏之后，陷于全面分裂的一个历史时期。统一或分裂，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文学来说，同样命运攸关。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在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就各不相同，至少有着重大差异。五代十国的文学，历来被认为是处于前有唐音、后有宋调的两个巅峰之间的一条峡谷。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宋代文学的复兴，可以说是统一的结果。五代十国文学发展相对停滞落后，则是分裂的结果，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在整个相对停滞落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文学也有局部的繁荣。前后蜀便是文学较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从时间上看，前后蜀文学处于五代十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前承唐音，后启宋调，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学。从空间上看，前后蜀政权偏安于巴蜀，其文学又不得不带上浓郁的地域色彩。因此，前后蜀文学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一种文学

形态。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有其独特性。因此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发现其特殊性,探索出规律性。

其一,对前后蜀文学进行全面研究,我们可以试图建构起前后蜀文学的体系,推动巴蜀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前后蜀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词)体现了浓郁的巴蜀地方色彩:首先,蜀地经济繁荣促使蜀人养成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其次,由于较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及自身民族传统的激发,巴蜀文人多有热情奔放的个性特征^①。从前后蜀的作家来看,无论是蜀产作家还是仕蜀作家,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前后蜀文学作品以及文人心态的具体分析,建构起完整的前后蜀文学史体系,从而建构起整个巴蜀文学体系。

其二,对前后蜀文学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重新审视五代十国的文学,重新思考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五代时期的文学评价明显偏低。牛运震在《五代诗话序》中说:“五代之乱极矣,政纪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阙如。”^②这一时期的文人或由唐末转入五代,如贯休、韦庄、卢延让等。或由五代转入北宋,如欧阳炯、幸寅逊、李涛等。这些作家或归唐,或入宋,很少有人把他们作为五代时期的作家,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的作家来研究。因此,人们对五代十国的文学,尤其是前后蜀文学是否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来研究,难免有所怀疑。

然而,这些作者或生于唐,或卒于宋,或产于蜀,或仕于蜀,

① 参见高锋《花间词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17 页。

② 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1 页。

他们的主要生活和创作时代却非唐非宋，而是五代，具体说是前后蜀时期。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前后蜀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来研究，并把它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下来全面考察其价值和地位。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不承认五代十国文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阶段，加上这一时期的名家不多，因此前后蜀文学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只注重“花间词”的研究，对其他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小说等大多无人问津。前后蜀到底有哪些作家，哪些作家作品应纳入前后蜀文学的研究范畴，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在看来，前后蜀文学的研究现状是：零星散乱，不成体系。

“花间词”是前后蜀文学中重要的部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花间词的研究成果较多，注释类的如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①、李谊的《花间集注释》^②、华钟彦的《花间集注》^③等。系统研究类的如高峰的《花间词研究》^④、艾治平的《花间词艺术》^⑤、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⑥等。

前后蜀时期的诗、文、小说以及其他作家，至今没有专著论及。只有少量的论文如张志烈的《秋花灼砾艳岷峨——简说前后蜀诗歌》、王定璋《骨气浑成，境意卓异——论贯休和他的诗

① 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② 李谊《花间集注释》，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③ 华钟彦《花间集注》，中州书画社 1983 年。

④ 高峰《花间词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⑤ 艾治平《花间词艺术》，学林出版社 2001 年。

⑥ 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 2006 年。

歌》、王瑛《杜光庭事迹考辨》^①等。

可见,前后蜀文学的研究现状相当薄弱,上述的研究成果十分零散,研究者大多是论其专人专事,并未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前后蜀文学的体系。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首先应当承认,由于前人尚未把前后蜀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进行研究,因此目前还没有这一阶段的整体性的材料。因此,对前后蜀文学进行研究,首先就需要对其所属作家、作品进行考辨,确定前后蜀文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一项基础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本论文将在这方面花大量的篇幅,对前后蜀的作家生平及其著作进行穷尽式的详尽考证。

研究文学史上的人和事,不能不求助于史。因此,前后蜀文学研究必然与前后蜀史研究结合起来,做到史论结合。傅璇琮先生在《五代诗话》序言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五代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五代是由中古(唐)向近古(宋)过渡的关键时期,宋及宋以后各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明显不同于唐代,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便是在五代完成的。如从五代开始,长江流域的经济明显地超过了黄河流域。南方商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又促使新的城市兴起,而这些城市所代表的文化形态,对宋代文学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傅先生认为五代诗歌以其通俗化的基本倾向,也明显具有从唐诗到宋诗的过渡性质^②。而前后蜀文学,作为五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诗词同样也具有这种性质。因此,傅先生

^① 均收入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 1994 年。

^② 傅璇琮《五代诗话》序言,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第 1 页。

这种研究方法给我们以良好的启发。本论文也将沿着同样的思路,讨论前后蜀文学,首先从唐末五代的战乱历史、分裂背景以及作家的艰难处境开始。继而在讨论作家,分析作品,论述其地位意义时,也将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进行。

一般来说,对一代文学的研究,首先应该选取几个既有鲜明个性特点,又能反映时代主题的代表作家,以他们的创作为主线,进行整体构架。但在前后蜀文学研究中,我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不算少,但也不算多。名家名作更是寥寥无几。可以这样说,前后蜀文学中根本没有一流作家,甚至二、三流作家也是屈指可数。怎样才能从那些小作家、甚至还算不上作家的创作中展现前后蜀文学的整体面貌,总结出其基本特点,给予其准确的文学史定位,看到它的价值,这是我苦思良久的问题。

在这方面,张兴武博士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贾晋华博士的《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都十分注重作家的群体研究。张兴武博士认为:“五代诗在唐诗和宋诗之间所起的,是一种整体嬗变和阶段演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首先是从作家群体人格的剧变中表现出来。所谓群体人格,是指一时代之全体作家(至少是大多数人)在对社会历史、政治形态、时代文化、世风人情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共同态度和一致追求。”^①因此,一定的文学阶段的主题取向、艺术创造上的变化和得失,都与这一时期群体性作家的人格相关。前后蜀文学的作家同样具有这种群体性。他们或生于蜀,或仕于蜀,或卒于蜀。但他们共同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或多或少地遭遇了命运的巨变。因此,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词、文)

^①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8 页。

在思想上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反映了相似的人生心态和人格追求。在艺术上,也具有相似的审美情趣和体式语言。因此,我想从作者的群体性(或称集团性)入手,再结合一定的个案研究,来把握前后蜀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总体风貌。这也许并不算是最好的方法,也不能算是最新的方法。

四、前后蜀文学的研究范围

按照通常的理解,前后蜀文学即前蜀、后蜀这两个地方政权统治时期和统辖范围内的文学。也就是从王建称帝(907)至孟昶降宋(965)这五十八年间的文学。但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考察,前后蜀的大部分作家,其生卒年几乎没有多少是限定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的,不是生于其前,就是卒于其后。同时,前后蜀文学的特色,也不是从公元907年王建称帝以后才形成的,也不是随着孟昶降宋、后蜀灭亡而荡然消失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政权的更替来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断限。

关于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了。清代王士禛所撰《五代诗话》一书,将五代诗的上限定在唐昭宗一代的诗人。李调元所编《全五代诗》,其所录唐末诗人有杜荀鹤、张乔、刘象、曹松、温宪等。这些诗人大多生活在唐昭宗一代。可见《全五代诗》所定上限与《五代诗话》基本一致,都将唐昭宗一代作为五代诗的上限。

傅璇琮先生在《五代诗话》序言中指出:

他(指郑方坤)对于五代诗的断限,并不拘限于朝代的更替,把其上限断至昭宗朝一代的诗人,这是有见识的。我认为我们若作五代文学系年,似可以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开始,那时黄巢起义刚平复,但各地节镇却乘机拥兵自立,中央朝廷名存实亡,割据之势已成。而这时如皮日休、陆龟蒙等与晚唐前期有联系的作家都已去世;余下如韦

庄、吴融、郑谷、黄滔、杜荀鹤等，莫不由唐入五代，他们的诗风也主要对五代宋初有影响。^①

作为五代十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前后蜀文学，其上限也不能仅断在王建称帝，也应溯于唐僖宗至唐昭宗一代。

其一，从有关史书看，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详述史实均从光启年间开始。路振《九国志》所载南方九国建国之年代，其中前蜀为唐昭宗大顺二年。可见，五代十国史研究都不能拘限于王朝之始终，何况其文学研究。

其二，就前后蜀作家本身来看，有些作家在唐末已很有名望，如韦庄、贯休、卢延让、杜光庭等。唐末的战乱局事、腐朽政治对他们的人格心态、诗文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这点看，唐末和前后蜀可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关于前后蜀文学的下限，习惯上应以宋灭后蜀为断限。

综上所述，我们把前后蜀文学的研究范围定在晚唐昭宗一代至孟蜀灭亡。

^① 参见傅璇琮《五代诗话》序言，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第 4 页。

第一章 前后蜀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前后蜀历史简述^①

四川古称蜀，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据史书记载，蜀是兴起于岷江上游的一个古老部族。蜀的第一代始祖叫蚕丛，后有柏灌、鱼凫相继成为蜀族的首领。接着，望帝杜宇、丛帝开明氏（鳖灵）先后统治蜀地。蜀的地域广阔，“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②。勤劳的蜀中儿女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再加上李冰治水，都江堰的建成，川西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③。农业的发达，使蜀地的经济实力自秦代以来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④秦国正是依靠蜀中的富庶才得以一统天下。“（秦）

^① 本节部分内容参考了杨立伟《前蜀后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特此说明。

^②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第175页。

^③ 左思《蜀都赋》，《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77页。

^④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第104页。

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①楚汉之争，刘邦凭借蜀中夺取天下，“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②。故司马迁云：“汉之兴自蜀汉。”^③

汉代以来，“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④。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强大的经济实力，使蜀地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经常出现割据政权，如新朝公孙述的“大成国”、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十六国时期的李成政权等。这些政权大多“恃险而富”，强极一时。隋唐以来的三百多年间，蜀中没有经历什么战争，形势稳定，经济富裕。故隋唐开国之君征战天下，都把蜀中作为战略基地，分兵东下，平定南方。唐代末年，黄巢起义，蜀中开始亦未受到波及，只是唐僖宗入蜀后，矛盾激化，三川鼎沸，蜀中大乱，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唐末蜀中形势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到了晚唐文、武、宣、懿、僖五朝，更是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统治阶级内部日益腐朽、阶级矛盾日趋恶化，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僖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尖锐地指出：

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

^① 郭允蹈《蜀鉴》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2册，第471页。

^②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第214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第686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一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535页。

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①

这段话充分暴露了唐朝末年危机四伏的局面。国有“九破”，说明唐王朝已不能够继续维持其统治，处于崩溃的边缘。民有“八苦”，说明当时人民已苦不堪言，走投无路，天崩地裂的巨变迫在眉睫。

僖宗乾符初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起义军转战南北，席卷全国，迅速攻破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广明元年(880)初，起义军逼近潼关，长安危在旦夕。当时的宦官田令孜为了逃避农民起义军的惩罚，乃“阴为幸蜀之计”^②。十二月，黄巢军攻破长安，田令孜仓卒率领五百名神策军簇拥着唐僖宗逃往蜀中。中和元年(881)正月，僖宗到达成都，蜀中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田令孜是蜀中人，本姓陈，在僖宗逃往蜀中之前，田令孜就操纵僖宗任命其兄陈敬瑄、亲信杨师立和牛勣分别为西川节度使、东川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这样“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③。特别是陈敬瑄，为了讨好田令孜和僖宗，

^① 刘允章《直谏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〇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3745 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中华书局 1956 年，第 8222 页。

^③ 同上书，第 8236 页。

僖宗刚刚逃离长安，他就一面派人奉表欢迎，一面在成都缮治行宫。僖宗到达后，成都集中了一大批官僚、宦官、军队、侍从，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开支。当时，“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①。唐僖宗一伙还可以暂时赖以生存。但是，由于唐廷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加上江淮贡献断绝，蜀中很快发生变乱。《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记载：

初，车驾至成都，蜀军赏钱人三缗。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四方贡金帛，辄颁赐从驾诸军无虚月，不复及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头，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独不受，起言曰：“诸将月受俸料，丰贍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觖望，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间，曰：“汝尝有何功？”对曰：“琪生长山东，征戍边鄙，尝与党项十七战，契丹十余战，金创满身。又尝征吐谷浑，伤胁肠出，线缝复战。”令孜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帅所部作乱，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之。琪引兵还营，陈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军攻之，琪夜突围出，奔广都，从兵皆溃，独厅吏一人从，息于江岸。琪谓厅吏曰：“陈公知吾无罪。然军府惊扰，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终，今有以报汝。汝负吾印剑诣陈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剑击之，墮水，尸随湍流下矣；得其印剑以献。’陈公必据汝所言，榜悬印剑于市以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8页。